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萧

殷

文学评论选



106/13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萧殷文学评论选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01764



湖南人民出版社

90176

萧殷文学评论选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6,000 印张：7.625 印数：1—8,600

统一书号：10109·1538 定价：（平装）0.84元
（简装）0.97元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下编辑的一套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选集汇编。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丛书，三十二年来，这是头一次。

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当代文学评论的经验，扩大当代文学评论的队伍，提高当代文学评论的质量，促进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互借重，共同前进。我们党历来认为，文艺评论是进行文艺斗争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手段。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但由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作家为标帜，而且以那个时期或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为标帜。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和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同等重要。

但是，由于种种失误和偏见，文学评论有时被当作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监督哨，面目令人生畏；有时被当成推销文学作品的广告牌，脸色显得苍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评论的状况大为改观。文学评论不但为文学创作开路，而且为文学创作服务；不但以尽可能正确的历史观点对创作进行思想分析，而且以尽可能正确的

美学观点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在拨乱反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方面；在同“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在批判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方面；在大力扶植新创作，为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勃然兴起的中篇小说和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呐喊欢呼方面；在热情鼓励题材、体裁、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坚定不移地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方面；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文学评论积极参与整个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完成了历史的使命。然而，只要面对现实，面对党和人民对文学事业的要求，就不能不承认，文学评论不但落后于时代，而且落后于创作。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总结不够，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问题研究不力，在推动文学创作发展上站得不高，缺乏理论的说服力和科学的预见性。

刚刚开过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向文学评论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这对于今后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评论工作者必须以此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坚持先进的世界观，努力以共产主义精神影响和教育人民，这就是我们的方向。

文学评论的队伍建设是个大问题。评论队伍的建设，一是思想建设，二是组织建设；既要提高，又要扩大。我们文学评论工作者应该认真学习十二大文件，划清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的界限，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培养自己成为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战

士。只有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先进战士，才能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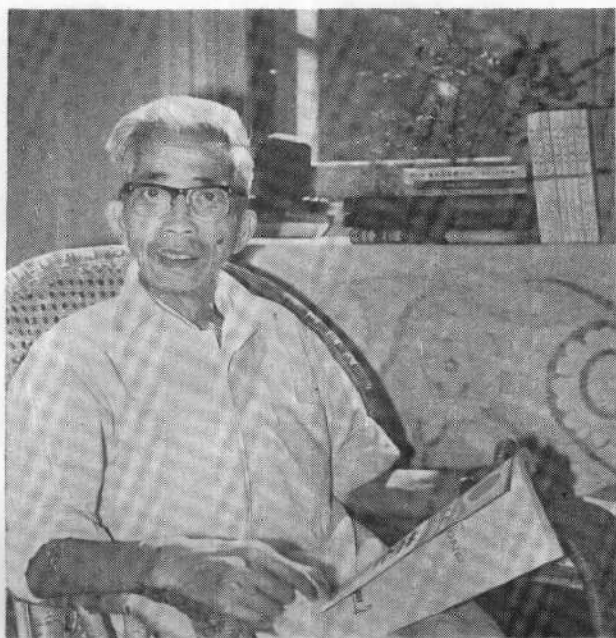
任务繁重而队伍甚小，这是个矛盾，扩大队伍的问题迫在眉睫。一九八二年七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大力发展文艺评论工作和充实文艺评论队伍的问题做了部署，响亮地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的口号。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今后的文学评论工作，势必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发展。

我们这套丛书愿为文学评论的发展铺路。这套丛书倘能收到实效，还可以继续编下去，借以促进人才的更多发现。

我们仓促上阵，又无经验，缺点一定不少，欢迎批评指正。

冯 牧 阎 纲 刘锡诚

1982年10月13日



目 次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	(1)
事件的个别性与艺术的典型性·····	(21)
论艺术的真实·····	(31)
求实精神与革命热情相结合·····	(41)
要善于从阴暗处看见光明·····	(51)

关于“问题小说”·····	(58)
---------------	--------

作品的“深度”是什么? ·····	(69)
-------------------	--------

——给赵启强同志的信

小说不是生活的任意再现·····	(74)
------------------	--------

如何反映人物的精神面貌·····	(82)
------------------	--------

——复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

谈谈写人物·····	(97)
------------	--------

是“英雄典型”，还是阴谋家形象·····	(105)
----------------------	-------

——斥“四人帮”对“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的无耻篡改

坚持写作实践与青年作者的成长·····	(112)
---------------------	-------

——答爱好文学的青年朋友们

给文学青年朋友们	(128)
《羊城一夜》序	(143)
《吕雷小说》序	(147)
《小城之夜》序言	(153)
《浪花·火焰·爱情》序	(156)
《银河纪事》小序	(161)
《习艺录》后记	(165)
《月夜》后记	(170)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173)
——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广东分会的一次谈话	
探索是为了什么?	(185)
试谈反映阶级斗争	(189)
——在一个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关于戏剧创作的几点感想	(202)
现实主义的胜利	(218)
论素材、消极现象及其它	(230)
——给一个习作者的复信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

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是广东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讨论所显示出来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越了《金沙洲》这部作品的范围，而涉及到文学理论与文艺批评上一系列原则的问题。典型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读者曾展开热烈的争论，其中不乏正确的立论，同时也有极其片面的见解。但无论如何，这种针锋相对的辩论，对于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探讨艺术典型问题，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正是在这种讨论的启发下，我们也想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千虑之一得，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种不宜忽视的阻力

在这次讨论中，有些文章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要求艺术的典型形象必须与总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甚至在典型形象与社会的阶级的本质之间，简单地划一等号。这种倾向，在不同的文章中各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加以归纳，突出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艺术典型仅仅归结为社会的、阶级的本质特征，

而丢掉了典型的个性特征。但其表现形态不一，有的以阶级本质的抽象概念来阉割人物的个性；有的直接以自己主观设想的某种政治条件来鉴定人物；有的拿国内一些优秀作品的主人公跟自己评价的人物简单地加以对照。

其二，把艺术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看成是数学的总和，两者只有外在的联系，而不是有机的统一体。因此在进行艺术分析的时候，就舍弃了个性而空谈共性。

其三，把典型性格与典型环境割裂开来，离开了典型环境而孤立地分析人物性格；或者以生活的主流来硬套作品中的典型环境，把典型环境抽象化和简单化，结果也和前者一样，抽空了作品的典型环境的具体内容，使人物性格游离于环境之外。

凡此种种，都表明对典型理解的混乱。其共同特点都是离开了文学的基本特性，脱离了作品的客观实际，既不分析生活，也不分析作品，而是从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抽出几条本质或规律加以对照或硬套，把艺术典型的创造看成是赤裸裸地“写本质”“写主流”的同义语，在艺术典型与时代精神、阶级本质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是由于忽视了艺术对现实认识的特点和反映现实的特殊规律——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的规律，对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环境与性格等问题作了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理解，没有看到其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

这种倾向，不只是表现在《金沙洲》的讨论中，在对其他作品的评论中也同样存在着；不仅过去有过，现在也仍然存在，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批评倾向，不但不能正确地阐明艺术典型的复杂现象，反而变成了一种创作的阻力，对艺术创作的发

展起了很坏的作用。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我们还没有这种能力。由于篇幅关系，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可能对上述的每一个具体论点都一一加以分析，我们只想针对它们的实质，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典型形象——熟悉的陌生人

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化，需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次讨论中的主要分歧，并不是典型形象要不要反映社会（阶级）的本质，而是怎样才能反映这种本质的问题。是用图解某一阶级本质的概念来表现社会（阶级）的本质呢？还是遵循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通过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形象，以“生活本身的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反映生活的本质呢？——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在一些评论文章中，虽然没有在理论上要求《金沙洲》的作者把时代精神和社会（阶级）本质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他们用以观察、评价人物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实际上是存在着这种错误思想的。他们往往脱离了作品的实际，以各种抽象的本质概念来要求人物，而不问人物的实际性格如何。例如一谈到刘柏，就要求他一定要具有“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和宏伟气魄”，以及“奋发的共产主义精神，大胆泼辣的工作作风”，似乎农村中的党的支部书记，就只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典型，好象除此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典型了。我们认为，典型性格是多种多样的，生活中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个性，艺术上就可以产生千差万别的

典型性格。既可以有完全没有缺点的理想人物，也可以有有缺点的正面人物，既可以有具有全新的思想风貌的农民党员干部的形象，也可以有正在改造、转变和成长中的农民党员干部的形象。《金沙洲》中的刘柏，既然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艺术构思所塑造的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就只能以他所固有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出现于作品中。《金沙洲》一开始就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使总支书记黎子安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和郭细九等上中农的破坏活动错综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尖锐的斗争和复杂的情况下，刘柏始终保持冷静和沉着，他一方面怀着尊敬上级的心情，向黎子安的作风提出了批评，希望他能够倾听群众的意见；另一方面，又通过社员群众的辩论，揭露郭细九等的破坏活动，给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有理有节的反击。在郭有辉的种种幕后的破坏活动尚未充分暴露以前，他怀着曾经和郭有辉一道战斗过来的真挚的阶级感情，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对他进行劝导、批评和教育，希望他能够觉悟过来，和自己同心协力，克服困难，把社搞好。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期待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花生地风潮中，他虽然受到各种挑拨性的攻击和谩骂，却仍然苦口婆心地说服群众，使一场带着宗派情绪的人为纠纷平静下来。而当高级社遭到经济困难，郭有辉等正偷偷从社里抽走投资的时候，他却以身作则，毅然把自己一家生活所托的分配收入全部投到社里去，并且机智地突破了富农和新上中农的关口，使他们不得不对社投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刘柏的踏实、稳重、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能够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一心要把高级社办好的优良品质，显示了他性格中最本质的一面。至于在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某种程度的焦急、苦闷和忧虑，如果从金沙社当时的混乱局面和他所处的具体环

境以及他的生活经历来看,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不但无损于这一人物的性格,反而显示了他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于金沙社命运的深切关怀。作者正是通过人物的这些心理活动,从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揭示了人物的感情世界,使形象的血肉更加丰满,更能显示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一个人物,尽管还不能成为理想人物的典型,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作者在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付出的劳动,是不容随意抹煞的。至于作者为什么把刘柏写成这样而不写成那样,为什么赋予他以这样的性格而不是那样的性格,则是为整部作品的艺术构思和特定环境所决定的。如果离开了这一切,主观地要求刘柏必须具有这种精神或那种品质,势必会阉割掉人物活生生的个性,使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而按照这种要求推论下去,也势必会得出一个阶层、一个社会集团在一个历史时期只能产生一种典型、一种性格的荒谬结论。

文学艺术总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的。所谓个别,就是具体的典型形象。只有通过具体的、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才能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社会(阶级)的本质和规律。阉割了人物的个性,人物的阶级本质也就无从表现。正是这种个性与共性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物完整的性格。有人说,梁甜“一面希望重温幸福的爱情生活,一面又摆脱不了封建意识的束缚;她拥护高级社,是因为家庭贫困,非依靠社不可,又怕拖累他人,思想上又有矛盾。在入社问题上看不到她具有远大的理想。因此,她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农村妇女干部的典型”。这种分析显然是脱离了生活实际和缺乏辩证观点的。梁甜,作为一个失去了丈夫而要一肩挑起一家四口生活重担的善良的女性,处在

解放前早已形成的带有传统封建习俗的特定环境中，她在爱情问题上所表现的封建意识和对于生活的忧虑，怕拖累人家而甘愿默默承担生活的重担，背地里暗暗流泪以抒发个人的不幸的悲哀，这一切表现，正是她抒发自己千端万绪的复杂感情的独特方式。而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中，面临着要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社，她怀着对于曾经帮助她解决了生活困难的初级社的眷恋和对于未来生活的惶惑，在入社问题上表现了无可奈何的心情，这是符合于她的生活经历、觉悟程度和性格特征的。这种来自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生活经验和习惯的复杂心情，未必就不能体现贫农这一阶层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别林斯基说得好：“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其所以是熟悉的，是因为作家对于这一类型人物的阶级特征作了高度的概括；其所以是陌生的，是因为作家赋予人物以丰富的、独特的生命——鲜明而生动的个性。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这里就包含着概括与个性化的高度统一。^①梁甜的性格，固然还没有达到这样高度的典型化，但作者所赋予她的独特的生命——个性，却是相当鲜明的。作者正是遵循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规律，通过梁甜

① 有人说：别林斯基这句话，原是谈论独创性的，认为本文对于这句话的解释是和原意有出入的。是的，别林斯基认为，有独创才能的人“两个人可能在一种指定的工作上面不谋而合，但在创作中决不能如此，因为如果一个灵感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两次，那么，同一个灵感更不会在两个人身上发生，这便是创作世界为什么无边无际永无穷竭的缘故”。因此别林斯基说，“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如果从典型创造的角度来看，承认有独创才能作家笔下的典型形象，都打上了各作家的“纹章和印记”的话，那末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些打上“纹章和印记”的典型人物，为什么不是“熟悉的陌生人”呢？那类典型人物不正是高度概括其本集团的特征，又赋予人物以独特的、鲜明的个性吗？它们不是使读者感到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吗？

性格的塑造，概括和再现了贫农阶层中这一类型的贫苦农民的命运和遭遇，揭示了她（他）们共同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离开了这一人物的独特的性格、遭遇和命运，离开了她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所形成的全部复杂的精神世界的细致分析，就不可能理解人物的性格，透视人物的阶级本质，也不能作出是否典型的结论的。硬要梁甜在入社问题上具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脱离了作品和人物的实际，而且也背离了艺术规律，取消了以个别反映一般，也就取消了典型的存在。

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规律，是由辩证法的矛盾规律所决定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主席在这段说话中，非常精辟地阐明了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第一，共性是绝对的。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人，莫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第二，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两者是互相渗透、水乳交融的有机的统一体，绝不是外加的数学总和，更不是互相游离、互相排斥的东西；第三，人物的个性，由于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是千差万别的，这一个绝不同于那一个。同一阶级的共性，只能通过人物独特的个性，以特殊

的形式表现出来。离开了鲜明的个性，所谓时代精神和阶级特性，就无从表现；第四，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这里所指的条件，不但包涵着人物自己的出身、教养、职业、思想、气质等各各特殊的因素，同时也包涵着特定环境中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正是这种特定环境中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人物性格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所以，某种典型性格只能产生于某种典型环境之中，依赖于典型环境而活动和发展，并反过来给环境以一定的影响。离开了典型环境，就无所谓典型性格。

由此可见，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是由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所决定的。离开了生活的辩证法，离开了以个别反映一般的艺术规律，就无法理解生活，也无法理解艺术。

典型环境，也是完全不可代替的“这一个”

文学艺术不仅反映现实，而且要给现实以积极的影响，“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文学艺术的这一基本特点，要求作家在艺术创造中必须进行艺术的概括，把现实生活典型化，使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普遍性。”典型化的过程，就是概括化和个性化统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全部奥秘，则在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是艺术创造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文艺批评只有依据艺术的这一基本原则，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进行具体的（历史的、思想的、艺术的）分析，才能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质量作出正